

惯习中心维度探析——论西米奥尼的惯习观

唐芳

(香港理工大学 中文及双语学系, 香港)

摘要: Simeoni 开启了对“译者惯习”的研究, 将惯习概念引入翻译研究。本文回顾了 Simeoni 主要的翻译社会学观点, 包括惯习在社会体系中的核心位置、译者屈从等, 展现了惯习与规范的相互衍生关系及惯习对描述翻译研究(DTS)的深化拓展作用, 强调惯习研究应避免决定论, 需通过真实再现惯习和规范的互动为 DTS 孕育出丰硕的成果。

关键词: 译者惯习; 译者屈从; 翻译规范; 描述翻译学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643(2011)04-0097-06

1.0 引言

Holmes 于 1972 年提出建立独立的翻译研究学科, 并描绘出学科全景图, 其中描述翻译学分支涵盖产品导向、过程导向及功能导向三大方向, 三者处于并列位置。(Holmes, 1972/2004)而后, Toury (1995/2001)作出修改, 将功能导向研究置于核心位置, 由此该导向不仅主导产品和过程导向研究, 还统领了应用翻译学与理论翻译学两大分支。Toury 的描述翻译研究为从文化视角切入翻译研究提供了明晰框架, 翻译研究者由此将研究重心从文本转向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因子, 如殖民主义、女性解放运动等, 希望通过对翻译现象的描述再现当时的翻译规范, 这无疑将 Holmes 对“社会—翻译研究”的设想推进了一大步。据 Simeoni (2007b)分析, 受学界国别主义传统影响, 直到 20 世纪末社会学理论才被系统引入翻译研究, 构成翻译社会学。该学科发源于欧洲, 主要受到法国社会学家 Bourdieu 和德国社会学家 Elias 理论的影响 (Simeoni, 2007a: 188), 而作为首位研究“译者惯习”的学者, Simeoni 深化了社会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联系, 推动了翻译社会学的发展。

翻译社会学主张以译者为切入口展开研究, 译者风格与技能的形成是一个认知发展过程。Simeoni (1998: 3)认为人类科学发展到今天, 对认知的研究确立了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 生物学派和文化学派。

前者以神经学、认知科学、实验心理学为代表, 注重大脑“黑箱子”中信息处理方式的研究, 将行为过程中外界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视为“噪音”(同上), 是实验过程中必须控制的变量; 后者以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为代表, 反对生物学派的“文化噪音论”, 认为所谓的“噪音”可能正是认知过程中的决定因素。翻译活动是在特定场景中、由特定原因驱动的社会活动, 在翻译思维研究中, 首要考察点即是翻译任务发生的场景。翻译决非完全独立于外界环境影响的纯粹行为。鉴于此, Simeoni 展开了对“惯习”(habitus)这一概念的详细论述, 着重揭示人类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2.0 惯习

2.1 惯习的定义与特征

“‘惯习’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 Plato 在《理想国》中提到‘模仿’(imitation)——发端于人的幼年, 但却对今后的人生产生巨大影响, 并最终形成习惯(habit), 构成‘第二本性’(second nature), 进而影响人的身体、声音乃至心智。”(转引自邢杰, 2007: 11) Aristotle 提出的 hexis 概念也与惯习类似, 它指与变化的定势(diathesis)和偶然行为(pathos)对立的一种稳定持久的“定势”。“hexis”取决于人的年龄、性格、社会地位等因素, 会在个人风格中“再现”。(Simeoni, 1998: 15)基于文明的进程理论, Elias (1996:

收稿时间: 2011-03-30

作者简介: 唐芳(1985-), 女, 汉族, 湖南衡阳人, 在读博士。研究方向: 翻译研究, 口译研究。

19—33)指出,除了受动物本能的和自然环境的限制,人类面对的另外两大限制是“Fremdzwang”(受限于他人)和“Selbstzwang”(受限于自身,源于自身的学习和经历)。由于经历各不相同,自我限制的模式也大相径庭。这里的“Fremdzwang”与 Toury 所谓的规范十分相似,“Selbstzwang”则类似于惯习概念。Elias 更多地从民族角度来阐释“惯习”,将其概括为“有所体现的社会习得”,是“一个民族几个世纪积累的财富在个体身上沉积”的实现方式。民族是某种特定文化惯习的载体,这种惯习以惯例的形式传递给本族人。

迄今为止,对惯习作出最系统论述的是法国社会学家 Bourdieu。他认为惯习是一套“定势系统”(system of dispositions),是人在成长、家庭教育、学校学习、工作、交际等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学习、内化及强化了的社会规律。(Bourdieu, 1990: 54)笔者认为从定义上看,惯习是各种因素的杂糅体,适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文化生产、经济生产甚至日常消费。

Thompson(1991: 12)提出了惯习“结构化”与“被结构化”的特点:“惯习……是结构化、持久的、生成性的及可变型的……这些生成的定势显然是被结构化的,因其不可避免地反映了习得过程中的社会环境。”

在笔者看来,惯习既非天生固有也非偶然形成,需后天长期的习得,该过程贯穿人的整个社会生活。惯习“被结构化”特征支撑着其可变性,当新的外力对认知构成冲击时,惯习会在固守、调适或屈从之间作出选择,对自身进行持续不断的构建;惯习的“结构化”特征表现为排他性和稳定性。惯习的排他性可以是个人的,如对某种商品莫名的厌恶;也可以是集体的,如回族人禁食猪肉。除非受外力迫使,惯习一旦形成就不会改变。

2.2 惯习的类型

Bourdieu(1986)在对惯习的阐述过程中,有时提到“场域惯习”,有时提到(具有阶级属性的)“个人惯习”。前者由共同的偏好、信念和技能构成,是特定场域得以自行运作的前提;而后者指一个统筹个体身心活动方方面面的统一结构体。

前人的研究倾向于按特定翻译场域划分译者惯习。Sela-Sheffy(2005: 9)指出对“译者惯习”的研究应该集中在一个特定的翻译场域内;同年, Gouanvic

(2005)勾勒出法国的美国科幻小说翻译场域; Hanna(2005)也对埃及的戏剧翻译场域进行了描绘。

而 Yannakopoulou(2008: 10)注重对个人惯习的研究。她认为在研究译者决策时,大到文本的选择小到翻译过程中微观层面策略的选择,译者的个人惯习可能比职业惯习更值得探究。因为职业惯习只能对部分选择作出解释,而剩下的、特别是受个人偏好驱使作出的选择,则需要从个人的生活轨迹着手寻找解释。

虽然 Simeoni(1998: 18—19)也强调惯习不仅限于职业技能,也与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但他却将惯习分为社会惯习(social habitus)和职业惯习(professional habitus),认为我们每个人作为社会成员都被赋予了社会惯习,但很少有人被赋予职业惯习。为什么 Simeoni 要略去个人惯习而加入社会惯习的概念呢?

笔者认为,翻译社会学的研究重点还应放在译者的“职业惯习”上。一方面,惯习研究在实际操作中仍以个案分析为主,由此得出的个人惯习包含着译者的职业惯习,这正说明译者职业惯习被印上了挥之不去的个人惯习烙印,由于两者之间缺乏明晰的界限,区分两者的尝试操作性不强;另一方面,参与翻译活动的各方——作者、读者、赞助人、出版社等——之间利益可能发生冲突,而译者由来已久的屈从更加剧了翻译行业的他治性,译者惯习作为一种职业惯习,并不只限于所在的特定翻译场域,如 19 世纪法国的美国科幻小说翻译场域仍受到社会惯习的影响。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想要出类拔萃,除靠高超的翻译能力,还须具备丰富的百科知识、良好的人脉惯习及老道的处世态度。所以对译者职业惯习范畴的界定,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正如 Simeoni(同上: 19)所言,译者的培养就是将社会惯习改良为职业惯习的过程,从社会惯习中分析出职业惯习将对翻译场域的构建起推动作用。

2.3 译者的屈从

回顾历史, Simeoni(1998: 7)认为译者如同古代的抄写吏,一直屈从于文化界的主流职业,他由此提出假设:从对专业技能的要求上看,与活跃在文化领域的其他人士相比,译者低等的地位迫使他们必须具备更大程度的屈从。

Janis(1996)曾对 18 位戏剧译者展开调查,探究他们是否感到自己屈从于剧作家、演员或观众。除

一位声称“我也是剧作家，拒绝成为任何人的侍从（servant）”，其他受访者都承认自己抱有侍从心理。具体来说，Janis 的问卷改编自对芬兰作家的调查，这体现了屈从不仅是对作者的刻画的也是对译者的；另一方面译者屈从确实广泛存在（94.4%的支持率）。因此 Simeoni（1998: 8）认定在无实验得出矛盾结论之前，人们应该默认译者屈从的存在。

20 世纪之前，西方译者往往屈从于原作者和原文本，而现代社会的译者则屈从于“客户”。Simeoni（同上：12）认为正如早期的作家屈从于委派工作给他们的君主，违反规则不仅意味着被冷落、嘲笑、排斥，甚至要遭受牢狱之灾。只有接受适当的培训、对宫廷中的规矩了如指掌且将之融于第二本性的作家才可能让其作品展现于世人面前。作者无权选择主旨、题材，正如译者无权进行创造、赋予文本新的意思。

那么译者的屈从又与其它行业的屈从有何不同呢？

Simeoni（1998: 23）认为译者常常做出保守的翻译决定，这不单是为避免制裁，也因为该选择是在培训、实践过程和个人经历中充分吸收并熟知的，译者更愿意沿用曾让自己成功的方法，因而其屈从不是被动的而是“自甘为奴”（servitude volontaire）。他们愿意屈从于客户、公众、作者、文本、意识形态等各方压力。

对 Simeoni 提出的“自甘为奴”这一观点，学界反对的呼声不绝于耳。Inghilleri（2003: 249）指出必须将译者对规范的屈从置于翻译发生的具体场景中考察，因为在实践中对规范的坚守与背离都可能发生。Sela-Sheffy（2005: 5）也认为“自甘为奴”的观点未免有些以偏概全，应避免以下两种误解：1）无论何时何地译者在文化界总是处于从属地位；2）屈从定势适用于行业中的所有个体。Yannakopoulou（2008: 9）肯定了大部分译者倾向于遵守当时盛行的规范，但对译者在惯习影响下不顾可能遭受的制裁对规范进行违抗的行为又作何解释呢？如果所有译者都遵从规范，创新又从何而来？抵制性翻译又何以出现？

其实 Simeoni（1998: 12—13）也曾提及译者解放思潮。但他认为这一思潮并非由译者群体而是外部观察者发起的。观察者相信客户、读者或语言施与的压力和限制并不具备普遍性和必要性，但这一观点却受到了大量译者的抵制，后者视屈从为翻译能

力的内在需求，将之纳入译者能力的考察范围。

笔者认为 Simeoni 夸大了译者的屈从性，轻视了译者的颠覆性。在生活中，我们听过译者的抱怨，比如因时间不充裕无法交出满意的译文、报酬太少等。这暗示了“译者期望”的存在——译者希望能有足够的时间对作品进行雕琢，希望自己的劳动能得到相匹配的回报，这种“期望”揭示了译者自身存在的抵触情绪，让我们联想到行业中所所谓的“不专业”、“不称职”可能正是译者对自治的争取遭到挫败的表现。随着文学翻译市场需求的日益收缩，商务、法律、媒体等实用性翻译市场的扩张，“屈从”观念也在译者群体中悄然发生着变化，比如译者可能因交稿时间太赶或报酬过低而拒接任务。正如 Simeoni（1998: 24）所言，惯习是社会秩序体系的真正轴心，翻译规范的更迭转换正是参与者（包括译者和学者）颠覆性惯习的作用使然。

2.4 惯习的局限性

人的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民族的，我们既无法穷尽所有发挥作用的、因素，也难以鉴定哪种因素最具决定性，哪种最无关紧要。各种影响相互交织导致的后果可能是片面理解（partial understanding）或概括型误解（generalized misunderstanding）。（Simeoni, 1998: 18）例如，在选择手表时，选择经济耐用款的人可能会对奢华大品牌选购者嗤之以鼻，前者并无法理解后者对精湛做工的苛求，他眼里唯一正确的购物原则就是用最少的钱买到最耐用的商品；另一方面，惯习的聚合合力会促使我们将无法解释的相似性串联起来：社会生活中个人作出的抉择常倾向于保持一致，从而形成个人风格，这种感知和行为的连续性能在交际中迅速得到辨认。然而个人风格并不能决定人的一切行为，正如爱因斯坦在生活中不修边幅，这是他对生活的态度，但我们无法就此推定他在科学研究中也会不严谨，这种概括型误解必须避免。

3.0 惯习与规范的关系

Simeoni（1998: 33）认为没有惯习使之具体化的规范与没有规范的惯习一样毫无意义。笔者认为惯习与规范之间是一种以人为中介的相互衍生关系：规范绝不会只存在于某个特定个体身上，它一定是群体性或者社会性的，是由个体与个体之间惯习的相互融合构成的；群体的规范会被群体内其他行为内化，继而成为他们的惯习，其他行为人对群体规

范的态度可能是接纳,从而使该规范延续;也可能是无视甚或背离,如此一来新的个体惯习就会出现,一旦个体的新惯习在同一群体中不断壮大,最终将会生成新规范来替换旧有的规范,这就是规范与惯习的“相互衍生关系”。按照 Elias 的社会生成观,一部译者史就是译者从受到显性的外来强制到将外部压力内化直至能进行“自我施压”(self-pressure)的历史。由此可见,在翻译任务中起决定作用的并非客观规范,而是译者在实践领域对规范的内化程度,只有被译者内化了的规范才可能在翻译实践中作用于译者,惯习才是整个社会秩序体系转动的轴心。(Simeoni, 1998: 24)

译者的惯习塑造了翻译规范,同时他们的行为也受翻译规范的制约。在翻译研究中将译者惯习置于轴心位置凸显了翻译行为对精神、物质、社会和文化力量的核心塑造力,惯习能从理论层面向描绘出上述矛盾势力的交汇融合,更好地展现翻译规范的形成过程与作用。

4.0 惯习拓展的翻译研究新空间

翻译研究比其它任何学科都更需要一种可从多种视角作出阐释的研究方法。(Simeoni, 2007a: 195)惯习这一概念无疑为功能导向描述翻译研究增加了一个全新的阐释视角,能进一步拓宽翻译研究的探索空间。

首先,惯习概念是对描述翻译研究的补充,对非常态案例有较强的解释力。以 Domenico Valentini 为例,作为莎士比亚所著《凯撒大帝》的首位意大利语译者、对英文一窍不通的他是凭借参加壮旅^①的英国游客的帮助完成这项翻译的。至今该译本仍被视为当时对外语文本最贴切的翻译。然而,正是这种贴近让他成了当时当地翻译规范的触犯者。若不引入惯习概念,对该案例的描述研究只能至此而止。但惯习概念的引入使我们可以对 Valentini 的生平展开调查,探究是什么力量让他作出违背翻译规范的决定?该决定是刻意的吗?出生于 17 世纪一个贫苦家庭, Valentini 有幸被伯乐相中进入精英学校学习,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跻身上流社会,然而卑微的出生让他处处遭白眼,与上流社会格格不入。他喜好阅读前沿资讯,与当时最优秀的批评家交往甚密,这一切都成就了他超凡脱俗的洞察力与理解力。对于当时的规范,他应该有所了解,却不为所动,是追求特立独行的个人惯习让他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规

范的对立面。

再如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周瘦鹃曾将文学作品中的大团圆结局改编成悲剧性结局。仅从翻译规范的角度考察无法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然而周瘦鹃自幼丧父,靠母亲的辛苦劳作才得以读完中学,如果将这种悲惨的生活经历纳入考察范围,可以推定正是自身的悲惨境遇让他对大团圆结局产生抵触情绪,倾向于选择悲剧性结局。

其次,惯习研究将展开更多对译者所在文化群体的研究。Fraser(1996: 87—93)通过内省法^②(introspection)考察了 21 位自由职业译者及 12 位社区服务译者对翻译任务的评述。结果显示在翻译策略方面,组别之间和社区译者内部都存在较大差异。差异究竟因何而起?受惯习思维的启发,Fraser 推测:自由职业译者内部的一致性是由他们以“营利”为主导的惯习所决定的;然而社区译者内部没有主导性的惯习,他们更多受到各自文化背景的影响。如其中一位主张加入更多解释性话语的社区译者其实是智利难民社团的成员,他的策略受到了保护受迫害团体利益这一惯习的影响。由此, Simeoni(1998: 25)认为惯习概念能为通过内省法、有声思维法以及瞳孔测量法(适用于口译研究)获得的数据建构更广阔的解释框架。

再次,对作者惯习和译者惯习的对比研究将成为新的课题。Simeoni(同上: 26)认为“准翻译场域”组织松散、译者根深蒂固的屈从性也决定了建构过程中较强的他律性。如果认为已存在一个由译者构成的独特“群体”,这种设想实属过于乐观。场域^③(field)形成的重要标志是行为人通过激烈的利益争斗,赢得更多的资本^④(capital),实现幻象^⑤(illusion)。但在现实生活中,译者大多自扫门前雪,交流不多,较量交锋就更少。翻译也是一种写作,对比“作者惯习”与“译者惯习”的异同将有利于翻译场域从文学场域的构建中吸取更多经验。

最后,不管是个人的或社会的,惯习一直在变化,这种变化也增强了惯习的解释力。如可利用惯习探究译者紧张情绪的诱因,构建对翻译任务难度的理性解释框架。翻译中的困难并非一个绝对值。首先,难点因人而异:可能是对语言结构的理解或对意象的再现等;其次,难的程度也不尽相同,同一翻译任务对初学者的难度往往超过对翻译家的。翻译规范是客观的,它对每个人都施与了相同的作用力,

然而以上的分析表明,个体对翻译规范的反作用力却各不相同,规范自身无法对此作出解释,需要惯习概念来补充:个体对规范的内化程度高,形成惯习,束缚感就小;对规范的内化程度低,未形成惯习,压迫感就大。因此为胜任翻译工作,译者必须不断调整个人惯习。

5.0 惯习对 Toury 描述翻译研究的影响

Simeoni 认为将惯习概念加入描述翻译研究(DTS)并没有削弱规范的地位,与 Holmes 对功能导向研究的定位以及 Toury 将该研究提升至核心地位的观念也都不冲突,只是研究重点有所转移——从文本和多元系统转向了翻译行为,从翻译规范转向了译者惯习。(Simeoni, 1998: 33)

Yannakopoulou (2008: 8)也提出同时考虑规范和惯习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译者的决定。规范只是译者作出决定的一个促成因素,要挖掘行为背后的动机就必须将译者的整个生活轨迹纳入考察范围。

然而,将惯习这一更高等级的概念加入 DTS 的框架中也揭露出该理论模型的局限性。Hermans (2004: 118—119)认为基于规范概念的 DTS 存在如下问题:1) Toury 只赋予了规范结构性特征,强调规范的客观性、稳定性,对于不稳定和矛盾的翻译策略缺乏解释力;2) 规范是客观的,其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为该研究印上了机械决定论的烙印,错误地认为翻译规范决定译者行为,有什么样的规范就产出什么样的译文,只要总结归纳某一时期、某一特定文化中的翻译行为特征就能重构“翻译规范”。

以惯习为中心的研究在重构翻译事实的过程中,将对翻译技能及其产品揭示的社会认知因素作更为细致的分析,兼具“结构化”与“被结构化”特征的惯习,将超越二元对立,对杂合的、动态的因素作出解释。然而对于第二个问题,无论是对规范描述还是对惯习的考察,都要小心陷入决定论的深渊;研究者们必须牢记于心:无论规范还是惯习都只能作为翻译决策的促成因素而非决定因素。

6.0 结论

虽然以惯习为中心的翻译社会学研究模型弥补了描述翻译学研究的一些缺陷,是翻译研究学科的一大进步,但该研究模型的应用范围也存在局限性。目前,对个体译者职业轨迹的研究尚不多见,这是因为从表层行为反推深层惯习的这种溯因模型推出的结论只具启发性,只能提供一种可能性而非确定性

的解释。虽然研究者可以通过访问、研读传记等方式获取译者的生平资料,但很难断言翻译行为究竟是对译者惯习在何种程度上的真实反映,因为他们面对的译文可能是译者向客户、公众、赞助人、出版社等多方力量妥协的产物。然而,理论的缺陷并不足以成为研究止步的理由,相反,它更应被视作进一步完善理论的助推力,相信随着惯习与规范研究的深入,相关的研究成果会给我们提供更丰富的启示。注释:

① 壮旅(Grand Tour)是指自文艺复兴后,欧洲贵族子弟进行的一种欧洲传统旅行,后也扩展到中欧、意大利、西班牙富有的平民阶层。壮旅尤其盛行于18世纪的英国,留下了丰富的文字记述。

② 内省法:是一种心理学基本研究方法,现被广泛应用在其它学科研究中,该方法通常要求受试把自己的心理活动报告出来,然后通过分析报告得出某种结论。

③ “场域”、“资本”、“幻象”是布迪厄构建的重要社会学概念,基于它们并非本文的重点,在此仅作简单介绍。“场域”指具有自己独特运作法则的社会空间;“资本”既包括有形的物质财物又包括无形的精神财富,布迪厄将之分成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幻象”指场域中参与者值得追求的特殊利益。

参考文献

- [1] Bourdieu, P.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6.
- [2] Bourdieu, P.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 [3] Elias, N. *The Germans: Power Struggl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abitus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 [4] Fraser, J. Mapping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J]. *Meta*, 1996, (41): 84—96.
- [5] Gouanic, J. A bourdieusian theory of translation, or the coincidence of practical instances [J]. *The Translator*, 2005, (11): 147—166.
- [6] Hanna, S. Hamlet lives happily ever after in Arabic:

- The genesis of the field of drama translation in Egypt [J]. *The Translator*, 2005, (11):167—192.
- [7] Hermans, T. *Translating in Systems: 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 [M] .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8] Holmes, J.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A] . In L.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Second Edition) [C] .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72/2004.180—192.
- [9] Inghilleri, M. Habitus, field and discourse: Interpreting as a socially situated activity [J] . *Target*, 2003, (15):243—268.
- [10] Janis, M. What translators of plays think about their work [J] . *Target*, 1996, (8):341—364.
- [11] Sela-Sheffy, R. How to be a (recognized) translator: Rethinking habitus, norms, and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J] . *Target*, 2005, (17):1—26.
- [12] Simeoni, D. The pivotal status of the translator's habitus [J] . *Target*, 1998, (10):1—39.
- [13] Simeoni, D. Between sociology and history: Method in context and in practice [A] . In M. Wolf & A. Fukari (eds.).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C] . Amsterdam: Benjamins, 2007a.187—204.
- [14] Simeoni, D. Translation and society: The emergence of a conceptual relationship [A] . In P. St-Pierre & P. Kar (eds.). *In Translation-Reflections, Refractions, Transformations* [C] . Delhi: Pencraft International, 2007b.3—14.
- [15] Thompson, J.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M] .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 [16] Tou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 .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5/2001.
- [17] Yannakopoulou, V. Norms and Translatorial Habitus in Angelos Vlahos' Greek Translation of Hamlet [J/OL] . 2008. Available from: <http://www.kuleuven.be/etra/papers/Papers2007/Yannakopoulou.pdf> [2011-01-03]
- [18] 邢杰. 译者“思维习惯”——描述翻译学研究新视角 [J] . *中国翻译*, 2007, (5):10—15.

Exploring Simeoni's Notion of the Pivotal Status of Habitus

TANG F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 Bilingual Studies The HK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Abstract: As the first explorer of translator's habitus, Simeoni introduces the notion of “habitus” into TS. This paper reviews his major thoughts inspiring the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 the pivotal status of habitus in the social system & translator's submission etc, depicts the interdependent relation between habitus & norms and the new space DTS expands by incorporating habitus. To avoid determinism in habitus research,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abitus and norms must be ensured.

Key words: translator's habitus; translator's submission; translation norms;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